

上海工厂企业领导干部认为生产目的的讨论具有迫切现实意义

脱离社会需要的生产非调整不可

本报讯 上海工厂企业的广大干部,重视本报十月二十日发表的《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许多同志说:读了这篇文章,豁然开朗,启发很大。在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过程中,弄清了这个根本问题,其他许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在经济战线和理论战线讨论这个问题,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下面是几个工厂的领导同志同本报记者的谈话。他们联系本厂的情况,从几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

重工业要真正为轻工业服务

倪一平(上海自行车三厂厂长):农轻重的问题已经讲了二十多年,一直没有很好解决。轻工业长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厂是一九八八年由二百多个小厂合并成的。我们生产的凤凰牌自行车畅销国内外,产量有很大增长。一九八八年生产八万辆,一九七八年生产一百四十八万辆,今年准备生产一百六十万辆。截至一九七八年,我们为国家和提供的积累达八亿六千万元,今年上缴的利润加税收可达一亿元。但是,我们的厂房二十多年基本上没有变化,国家给我们的投资少得可怜,历年加在一起只有二百八十七万元,只占上缴积累的百分之零点三三。因为没有钱盖厂,我们几个车间都是临时性的棚房,下雨时,外面下大雨,车间里小雨,工人们要撑着伞劳动。夏天车间内温度高达四十度以上。电镀车间散发有毒气体,无法排除。我们在一九七六年就想新建一个电镀车间,但一直没盖成。

有人说,只有重工业发展了,才能对轻工业提供设备、原材料。这话听起来也有道理,但实际上,我国重工业并没有认真为轻工业服务。重工业系统给我们自行车厂提供的都是通用设备,

没有专用设备。我们厂的全部专用设备都是自己造的。我们用的钢材是国家调拨的,但有些钢材品种不对路,质量不合格,使用率很低,造成很大的浪费。我国有那么多钢铁厂,但没有一家工厂生产自行车专用的钢材。这些都妨碍了轻工业的迅速发展,影响全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自行车,我们理应尽快满足他们的需要。问题就在于能不能给轻工业提供更多的设备、设备和合格的原材料。这就需要首先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真正从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出发来安排生产。

钢铁工业不能片面追求产值和利润

张正国(上海第二钢铁厂副厂长):为生产而生产,为积累而积累,不按国家和人民的实际需要组织生产,这是钢铁工业至今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现在,重轨、中板等产不出去,积压在仓库里,而轻纺工业、建筑行业迫切需要的钢材很缺乏,严重妨碍了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增长和建造住宅的进度。

为什么这一状况改变不了?这是没有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片面追求产值和利润的结果。只顾抓产量高、利润大的产品,明知产品不对路,已经滞销积压了,还不肯按照国民经济调整的要求改变。

我们厂有一个车间一直生产八到九毫米的线材。今年九月份,轻工业部门需要我们提供六点至五毫米线材。我们算了账:由于规格改小,在同样生产时间内产量要减少五千吨,产值要下降二百三十五万元,少收利润五十多万元。开始,我们想不通,后来,上级做了工作就这样干下。事后回顾,虽然我们厂做了“减法”,但从全局看却是一个“乘法”。

衡量一个钢铁企业成绩的大小,光看产值和利润是不够的,首先要看它的产品是否按国家的需要生产,对短线产品的增长作出了多大的贡献。现在,有些地区实行部分钢铁由企业自产自销,以解决销路问题,这样做是好的;但要防止一面推销,一面继续大量生产,造成新的积压。

不按社会需要生产必然受到惩罚

订货合同成套交货了事,根本没有考虑用户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不少单位急需冷床设备,即使我们产品压着也不能给,非得逐级上报,层层审批,等待统一分配,结果使工程一拖再拖。

从今年八月起,我们在有关部门同意和支持下,对一二五毫米系列冷床设备实行自产自销。这样一来,我们感到压力很大,因为如果产品再积压,就要由厂负责,就会影响职工的收入。于是,我们组织力量访问用户,征求意见,了解需要,介绍产品,还在报刊、电台登广告,招徕生意。两个月来,不仅给今年积压的设备找到了销售对象,而且落实了明年第一季度的生产计划。为用户服务方面也有了改进。除了按计划供应用户冷冻设备外,还实行“点菜成厨”,用户既可单独订购主机,也可订购购机或零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我们看到,弄清生产的目的确实很重要。

华国锋总理致电卡翁达总统

坚决支持赞比亚政府和人民反击罗得西亚种族主义势力武装侵略的正义斗争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二十七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打电报给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强烈谴责罗得西亚种族主义势力对赞比亚的武装侵略,坚决支持赞比亚政府和人民的正义斗争。电报全文如下:

罗得西亚种族主义势力最近派出突击队,武装侵犯赞比亚领土,肆无忌惮地破坏赞比亚的公路、铁路桥梁等经济设施,使赞比亚的经济和人民生活蒙受严重损失。这是罗得西亚种族主义势力对赞比亚人民入侵新的新的严重罪行。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强烈谴责种族主义势力的野蛮行径,对赞比亚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慰问。

罗得西亚当局如此疯狂地武装侵略赞比亚,显然是企图迫使赞比亚等非洲前线国家放弃对津巴布韦人民民族独立斗争的支持。但是,这完全是徒劳的。他们的野蛮挑衅只能更加激起赞比亚人民、津巴布韦人民和非洲人民的更大的义愤和坚决的斗争。目前,赞比亚政府和人民在阁下领导下,不畏强暴,同仇敌忾,采取各种有力措施,为反击罗得西亚种族主义势力的武装侵略,保卫自己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安全进行英勇斗争。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你们的正义斗争。我相信,正义在你们一边,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赞比亚人民、津巴布韦人民和非洲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于北京

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座谈讨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问题

采取措施整顿大中城市社会秩序

许多委员指出,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北京“西单墙”干扰四化建设,应予以处置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二十七日电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今天上午和下午分别举行分组讨论会和全体座谈会,委员们就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整顿城市社会秩序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认真的讨论。

委员们在发言中指出,当前全国治安形势总的说是良好的,农村形势更好,城市情况一般也是好的。但是,有的大中城市社会治安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以维护安定团结,保证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委员们在发言中都赞成通过决议,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制定的法律法令,除了同五届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宪法、法律、法令相抵触的以外,继续有效,以便进

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更好地运用法律武器同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进行斗争。他们指出,目前在一些大中城市,刑事犯罪分子破坏社会秩序、危害人民安全,广大群众要求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和制裁。委员们认为,要搞好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全国人民都应该支持司法机关的工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同时还要依靠广大群众,特别是城市居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治安保卫委员会等群众性组织,要迅速恢复、健全起来,以发挥人民群众在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伟大作用。

许多委员在发言中还指出,北京“西单墙”被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破坏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干扰了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他们要求采取措施,予以处置。

许德珩副委员长说,“西单墙”成了一些人的“自由”论坛,外国人也插手它。反革命分子魏京生之流是把它当作一个阵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我是个经历几个时代的人,领略过资产阶级所谓民主、自由的味道。现在

一些人,在“西单墙”上大讲什么“自由”、“民主”,我觉得这种东西“似曾相识”。当前,我国最大的政治就是保证在安定团结的政治形势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有的人却利用这块墙作阵地来干扰这个最大的政治,我们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张文裕委员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那些公开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并同外国人勾结,让外国人给他钱和给他政治材料进行反社会主义制度活动的分子,要严惩不贷。魏京生的案件就有外国人插手。一个外国记者在一篇报道中说,近一年来,外国人广泛地插手了中国的“民主运动”。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李瑞环委员说,有些人打着民主的幌子,到“西单墙”上贴大字报,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出恶情,报,有些人人在那里聚众闹事,破坏社会秩序,这是社会主义法制所不能容许的。如果允许这几个人的“民主”,就会伤害全国人民的民主;如果照准这几个人的“自由”,就会损害全国人民的自由。如果容忍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就违背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危害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来自河南的盛委员说,我们的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对各级领导都可以提意见,对国家事务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对待意见的人采取“三不”政策。有人说什么“全国、全国都没有民主,只有西单一块墙上有民主”,实际上是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在利用“西单墙”破坏人民民主。

来自江西的向腊玉委员说,我最近几次来北京参加人大常委会,群众都要我代表他们提出取消“西单墙”的建议,因为它被极少数坏人用来兴风作浪,煽动闹事,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安定团结。她说,现在有些人只爱民主,不要集中,不上班,搞串联,利用大字报造谣生事,唯恐天下不乱。他们还想搞乱中夺权那一套,可见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还很深,还要大力肃清。

荣毅仁、陈此生、林丽韫、程世才、李延禄、章瑞英、汪月霞、董天祯、章福财委员等在发言中都谈到“西单墙”的问题,并且建议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清远县改革工业管理体制迈出大步

县经委用经济办法管理工业企业

据新华社广州十一月二十二日电 新华社记者戚报道:广东省清远县已撤销了县里的各个工业局,把县经委由行政机构改为联合公司性质性的经济机构。现在的县经委拥有对人财物和供产销的自主权,用经济办法统一管理全县的工业交通生产。

改革后的县经委,负责组织全县工交系统完成国家生产计划和上缴利润任务。全县各工交企业的生产经营、生产调度、物资分配、干部配备、劳动工资等,统由经委来领导管理。

根据工作需要,县经委下设七个科室,并分别设立了二轻工业公司、陶瓷工业公司、社队企业供销公司以及矿山管理站、机修服务站和公司实行单独经济核算。

县经委工作人员的经济利益同全县工交系统的盈亏密切相关。工交系统超额完成利润计划,县经委工作人员也享受超额计划利润提成,拿一定数量的奖金;如果完不成上交利润计划,按规定扣除经委有关人员的部分工资。

清远县从去年十月开始,在全县十多个国营工厂中试行超额计划利润提成奖,由此入手扩大县属国营工业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但在试行过程中碰到很多阻力,暴露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许多矛盾,束缚了企业和工人的积极性。矛盾主要表现在:工业管理机构重叠,人员过多,互相牵制,办事效率低,单纯依靠行政办法管理,官僚主义作风严重,这种状况不改革,经济工作就不能前进。

在广东省委和韶关地委的支持下,清远县委解放思想,从今年四月份开始改革工业管理体制,撤销县里的各个工业局,设立一些必要的专业公司,把县经委由行政机构改为联合公司性质性的经济机构,扩大经委的经营管理权限。县委为经委配备了比较精干的领导班子,选拔了一些富有朝气、有经济工作经验的干部,担任经委的领导职务。几个月的实践表明,这样改革好处很多:

一,简化了机构,精简了人员。原来局以上的管理机构有九个,有工作人员一百四十六人。撤销各个工业局以后,由经委统一管理工交企业,层次减少,上下通达迅速,办事比过去灵活,工作人员减为八十一人,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四点五。精简下来的人员统一分配到基层,年老体弱的离岗退休或退休。

二,全县工交企业统归经委主管,避免了多头领导,也大大减少了企业的“苛捐杂税”。经委同企业同呼吸,共命运,因此对企业卡脖子的事情少了,替企业解决问题多了,办事效率大大提高。

三,经委有了财权,可以在企业之间调剂流动资金,解决生产的急需,并有能力支持企业搞革新、挖潜、改造。

清远县的这一改革,明显地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今年一至十月,这个县工业利润比去年同期增加三倍多。



新形势 新任务

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权利终于得到恢复。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通过投票表决,批准了名古屋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议。这一决议确认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为中国全国性奥林匹克委员会,允许设在台北的奥委会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机构留在国际奥委会内,其名称为“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它使用的旗、歌和会徽应有别于目前使用的旗、歌和会徽。决议体现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根本事实,同时又照顾到台湾地区的实际情况,使我国台湾地区运动员可以和祖国大陆运动员一起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一个好的决议,它已获得我国体育组织和国际体育界的热烈欢迎。

奥林匹克运动会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运动会,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早在二十年代,我国体育组织即向国际奥委会所承认。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曾于一九五二年派代表团参加了在赫尔辛基举行的第十五届奥运会。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际奥委会曾不得不中断同国际奥委会的联系。现在,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国际奥委会已就我国奥委会的代表权问题作出了一个现实可行的决议。我国奥委会已正式宣布接受这一决议,从而在我国奥委会和

国际奥委会的关系上揭开了新的一章。中国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将在国际体育大家庭中,与各国朋友一起,互相尊重,友好合作,为推进以和平友谊为宗旨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作出积极的努力。

国际奥委会的决议为我国台湾地区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提供了机会。我们希望台湾的有关当局接受这一决议。这样,居住在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我国运动员将并肩地出现在运动场上,互相学习,互相勉励,为发展祖国的体育事业,争取中华民族的光荣,共同作出努力,并为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作出贡献。

三十年来,我国的体育运动有了长足的发展。亿万人民坚持体育锻炼,运动水平不断提高。我国运动员,包括台湾地区的运动员在内,曾经打破了四十项世界纪录,获得了几十次世界冠军。这说明我们中华民族在体育方面,象在其他方面一样,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由于我们底子太薄,起点很低,在不少体育项目上,与世界上水平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奥林匹克会徽上写着“更快、更高、更强”的口号,它激励运动员永不能满足于已有成绩,要朝着更高的目标前进。我国运动员要树立勇攀世界高峰的雄心壮志,不断创造新的成绩。明年将举行第十三届冬季奥运会和第十二届奥运会。我国将派运动员参加。现在,奥运会开幕的时间已经迫近迫近。我国运动员要立即行动起来,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刻苦训练,争取在奥运会上取得较好的成绩,为祖国争光。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笔记

童大林 吴明瑜 鲍 彤

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知识，尊重有知识的人。

我们过去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经济建设等各方面的工作中，都跌过一些跤。有些错误，一犯再犯。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是在做这些工作时，不尊重客观规律，违反了科学，甚至违反了常识。

犯错误，违反客观规律，当然同我们知识不足有关。但问题不仅在于这里。问题还在于我们对有知识的人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如果我们能够创造条件，使各方面的专家和内行都得以施展所长，很多违反客观规律的错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知识是力量，不是罪恶；“知低德便高，专多红就少”是没有道理的。

对知识怀疑忌态度，不是工人阶级应有的观点。从本质上说，它反映了旧社会中那些遭受压迫但还没有充分觉悟的小生产者的心理。他们被剥夺了学习知识的条件，本能地把知识看成是自己无法支配的异己力量。他们受狭隘的眼界所束缚，不懂得知识在社会发展中的伟大的革命作用。对旧世界，他们有反抗的要求，但是不了解，在破坏旧世界的时候，不应该把人类的知识宝库抛弃掉，在建设新世界的时候，处处要依靠接受的力量。小生产者不是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军，能够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事实上，在党的教育下，小生产者出身的不少同志克服了这种错误观点，勤奋好学，孜孜以求。但是，也确有一部分同志还没有脱出这种蒙昧状态。在他们看来，仿佛“知低德便高，专多红就少”。应该指出，以无知为荣，以外行自诩，这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在我们的一些同志中间，并不是罕见的。

“四人帮”正是利用了我们队伍中的这些错误思想，把它推向极端，摆弄起那根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棍子，对知识进行毁灭性的围剿。

旧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多数是脑力劳动无产阶级，相当数量是自由职业者，他们都不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占很少的数量。

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马克思是这样分析知识分子的：“在学校中，教师对于学校老板，可以是纯粹的雇佣劳动者，这种教育工厂在英国多得很。这些教师对学生来说虽然不是生产工人，但是对雇佣他们的老板来说却是生产工人。老板用他的资本交换教师的劳动能力，通过这个过程使自己发财。戏院、娱乐场所等的老板也是用这种方法发财致富。在这里，演员对观众说来，是艺术家，但是对自他的企业主说来，是生产工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分册第443页）

马克思又说：“密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5镑，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密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后来，他把作品卖5镑。但是，在书商指示下编写书籍（例如政治经济学大纲）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却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一个自行演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是，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用，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唱歌，她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分册第432页）

马克思是严格地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上使用“生产劳动者”这个概念的。这里所说的“生产劳动者”，是指生产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者，也就是在上述引文中所说的“生产工人”。（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分册第142页）

马克思对教员、演员、作家、歌女所作作的这些分析，无疑也适用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事其他活动的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师、医生、新闻记者等等。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三种知识分子，分别属于三个不同的阶级。

一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企业老板等等中间的知识分子。他们属于资本家阶级。他们之所以属于资本家阶级，丝毫不因为他们有知识，而是因为他们是老板，因为他们占有资本，因为他们剥削雇佣劳动者，攫取剩余价值。此外，还有分享一部分剩余价值的资产阶级代言人和代理人，也属于这一类。

一种是被资本家雇佣的知识分子。他们属于工人阶级。不管他们是从物质生产的（例如工程师）还是从事精神生产的（例如教员），他们都是受雇于资本家的体力劳动者一样，是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工人。

一种是自行开业的医生、自行设馆的教师，自行研究的发明家，自由投稿的作家，自行演出的艺术家等等。他们是自由职业者。他们的阶级地位，和独立从事劳动的体力劳动者相同，属于小资产阶级。他们不受雇于人，不为老板创造剩余价值，因此，不是工人。但是他们并不雇佣工人，因此，他们不是资本家。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在知识分子中，大量的生产剩余价值的工人，自由职业者也有相当数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占极少数。

因此，把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笼统地归入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范畴，是不正确的。

我国现有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把他们说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错误的。

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知识分子笼统地归入资产阶

级的范畴，更是不正确的。

我国现有的知识分子，大致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一、全国解放以前，就有大量的知识分子，离开了他们原来的社会活动岗位，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他们是以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作为自己的职业的。显然，他们早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二、在全国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工农分子中，许多同志已经知识化了。他们拥有丰富的甚至非常渊博的知识，常常使一般的知识分子为之心折。毫无疑问，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我国工人阶级中最早实现知识化的先驱。

三、旧社会中受雇于私人资本家、官僚资本家以及外国资本家的知识分子。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他们先后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职工。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他们在资本家的企业中从事雇佣劳动的时候，就是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难道在资本家的企业被改造成社会主义企业之后，他们反倒从生产工人变成“资产阶级”了吗？应该肯定，他们虽然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但不是资本家，而是受资本家剥削的生产工人。

四、旧社会中的自由职业者，解放以后，也陆续参加了工人阶级的队伍。他们中间的上层，生活比较富裕，即使如此，也不是资本家，而是独立工作的脑力劳动者。他们中间的下层，则同上说的第三部分人（生产剩余价值的工人）非常接近，甚至很难划出一条截然分明的界限来。实际情况常常是这样的：找到职业，就成为受雇于学校老板的工人，一旦解雇，则成为教家馆的私人教员；有时是受雇于书店老板的编辑，有时（或同时）则又是自由撰稿的作家；如此等等。进入新社会后，在二三十年的大过程中，他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直执行着国家所分配的任务，过着工资劳动者的生活。今天，他们都是至少有二十多年工龄的老工人了。

五、在旧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有数量很少的一部分，按照他们当时的经济地位，确实是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改造以前，他们是以占有剩余价值为生的。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他们接受了党和国家的和平改造政策，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他们的阶级地位起了变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水平比其他的工人高，但是，这些并不是划分阶级成分根据。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他们同其他的工作人一样，为社会主义企业劳动，并向社会主义企业领取自己应得的劳动报酬——工资。过去，这些知识分子曾经是资本家，这是事实。今天，他们已经开始站到工人的行列中来，是在以自己的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了，这也是事实。我们应该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地肯定这种根本的变化，帮助他们认识到由于这个变化而肩负的责任。土地改革的时候，他们曾经肯定地主分子在土地改革后改变阶级成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据此制定了相应的政策。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政策直到最近才认真地加以实施。人的阶级成分，同其他的事物一样，都是可以变化的。对于原来属于资本家成分的知识分子，我们也应当采取这种承认变化、承认发展的观点，正确地对待他们。要是把他们看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符合发展变化了的实际情况的。

六、全国解放以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我们党的教育下，通过各种途径培养了大批新的知识分子。在整个知识分子队伍中，这一部分人数最多，而且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他们的数量将会越来越大。能够把这些同志归到资产阶级那里去吗？如果允许那样做，简直就是对我们党领导下的学校教育工作、社会教育工作以至全盘革命工作的嘲弄。我们热爱人民群众，在全国范围内（除台湾外）消灭了剥削阶级。难道我们党在自己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在自己建立的教育体系中，反倒培养出了成千成万的资产阶级！诚然，在新的一代知识分子中，有少数人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但是，即使是他们的家庭，也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至于这些同志本人，那么，当他们踏入社会的第一天起，就成了工人阶级的新成员。只要去掉了反动的血统论和封建的世袭观念，这个问题是不难分辨清楚的。还需要指出，在新的一代知识分子中，大多数本人本来就是劳动人民的子弟。他们是工人阶级自己身上长出来的骨肉。对他们来说，不存在什么依附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的问题。他们的任务，是继承和实现自己父兄未竟的事业。党号召大家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他们积极响应了党的号召。他们同工人阶级的其他成员相比，唯一的特点只是掌握了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硬把掌握了知识的工人说成不是工人，硬拿资产阶级的帽子往他们头上扣，是毫无道理的。

我国现有的知识分子队伍，主要由以上六部分组成。其中，只有人数极少的第五部分人，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中间不少人早已参加了社会主义企业的工作。从他们的现实经济地位来说，也已经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劳动者了，而不再是占有资本的资本家了。除此之外，其他五个部分人，根本都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他们中间，有的是在中国消灭剥削制度而进行了几十年斗争的战士，有的是在旧社会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饱受资本家剥削痛苦的老工人，有的是在旧社会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终于在社会主主义制度下归入了工人阶级队伍的脑力劳动者，有的是新社会自己培养出来并且吸收到了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新的新一代。由此可见，只要严格地遵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按照经济地位来划分阶级，就应该如实地肯定，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确实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把他们推到资产阶级那边去

是完全错误的。

必须坚持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不应该拿世界观作为划分阶级的依据。

能不能拿世界观作为划分阶级的依据呢？

马克思说得对：“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同样，不是各种不同的世界观创造了各个不同阶级，而是各个不同的阶级形成了各种不同的世界观。不应当用世界观的状况来解释阶级的状况，而应当用阶级状况来解释世界观的状况。拿世界观作为划分阶级的依据，叫做本末倒置，是违反我们无产阶级自己的世界观即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

划分阶级的依据，只能是人们的经济地位，即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和剥削关系。这是唯一合乎科学的依据。搞过土改的同志都知道，我们在农村划分阶级成分时，就是这样做的，谁是地主、富农，谁是富裕中农、中农，谁是贫农、雇农，都是根据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和剥削状况决定的。党中央有着明确的政策界限，不仅有量的规定，而且有量的规定。土改工作队都有严格的组织规定。如果在土地改革中拿谁是什么世界观来决定谁是哪个阶级，岂不天下大乱！如果在土地革命时期那样做，我们的红色根据地就根本无法建立起来。如果在解放战争时期那样做，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大片解放区都得丢光，哪里还谈得上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也许，脑力劳动者的情况有点特殊，不能用经济地位而必须用世界观去划分他们的阶级成分？

这种观点的实质，是认为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不适用于脑力劳动者，对他们无法进行阶级分析。

正是马克思本人，在解剖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时，透彻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除了前面已经引用的马克思对教员、作家等脑力劳动者所作的分析以外，让我们再引一段马克思专门就这个问题所作的原则性论述。他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物质生产是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劳动的产品，或者说不妨碍他们的共同劳动的产品体现在物质财富中；另一方面，这一分离也丝毫不妨碍：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对资本的关系是雇佣劳动者的关系，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人不仅直接从物质财富的生产，并且用自己的劳动直接同资本为多数人的货币变换，因而不仅把自己的工资再生产出来，并且还直接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他们的劳动是由有酬劳动加无酬的剩余劳动组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分册第444页）

马克思说得非常清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丝毫不妨碍对资本主义这一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阶级关系作出分析。一个人，只要在对资本的关系这个特定意义上，处于雇佣劳动者的地位，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那么，不管他是脑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都是受资本家剥削的生产工人。只要承认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就应当承认这个科学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就应当承认对脑力劳动者同体力劳动者一样，是应当并且可以进行这种分析的。

资产阶级世界观是会反映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的。它会反映到工人阶级的脑力劳动者身上，也会反映到工人阶级的体力劳动者身上，还会反映到工人阶级先锋队内部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这种现实，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根绝这种现实。对于这种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毫无疑问，应当向他们提出批评，应当对他们进行教育，但是不能因此而否认他们的工人阶级成分。

如果用世界观作为划阶级的依据，工人阶级中有的人就会被划到资产阶级那里去，有的人就会被划到资产阶级甚至地主资产阶级那里去，岂不把一个阶级划得四分五裂。如果那样去做，阶级都不成其为阶级了，还谈得上什么阶级分析？

什么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某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世界观，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写《道德经》的老子到底是什么世界观，众说纷纭，两千年来定不下来。按世界规划阶级，根本是行不通的。其实，所谓按世界规划阶级，只是不顾经济地位的事实，乱扣资产阶级的帽子。林彪、“四人帮”十年反革命大破坏中，不仅对知识分子以世界规划阶级，而且以世界定罪，教训太深刻了，使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比方说，定罪必须依法，这是一条。定阶级必须有经济地位，也是一条。

否定以世界观作为划分阶级成分的依据，丝毫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世界观的重要性。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丝毫不意味着从此就不改造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全体成员，包括其中的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大家都要改造，这种改造，同对异己阶级的改造是性质根本不同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我们大家都应当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认真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同心同德，使我们办的事更符合客观规律一些，把现代化建设搞得更好一些。

是勉强强逼到工人阶级里来的一部分吗？

在党中央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对

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科学的分析，明确指出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论断，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赞同。

能不能说，在我们的同志中间，对知识分子的认识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呢？

恐怕现在还不能作这样的估计。

实际生活中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现象：一说依靠工人群众，为工人服务，向工人学习，大家都认识到这是天经地义；但是，一接触具体问题，往往不把知识分子当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来看待。比如，办研究所要依靠科学家，办大学要依靠教授，外行应当尊重内行，内行应当有职有权有责，决策应当由有关专家参加研究制订，后勤工作也要全心全意为知识分子服务，文艺也应当努力表现我们的知识分子，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意见就不那么一致了。有些同志就不以为然，至少觉得有点理不直气不壮。这些同志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处在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承认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敢或不敢据以落实到各项具体工作中去。

按照这些同志的观点，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虽说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似乎并不是合格的一部分，似乎是勉强强逼凑进来的一部分，似乎这一部分，既不在头部，也不处在躯干上，只是一条可有可无的尾巴。

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长期流传着一种错觉，似乎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属于资产阶级范畴。后来，“四人帮”把新社会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也弄到那个范畴里去，变成凡知皆资，影响很坏。也有同志虽然接受了党中央对知识分子状况所作作的正确估计，但仅仅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刚刚改造过来”的人，他们没有认识到，即使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也老早就已经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了。为了澄清这种糊涂观念，需要提倡认真学习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另一个原因：对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地位缺乏认识。这也是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非常优秀的一部分；他们的科学家、管理家、教育家、文艺家等等，同他们的政治家、军事家一样，都是在各自的领域中走在前面的先进分子。

列宁对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给了极高的评价。他说：“各国工人运动史表明，最先和最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是知识水平最高的工人部分。”（《列宁全集》第4卷第246页）

什么是“知识水平最高的工人部分”呢？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吗？列宁又说：“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某个阶级的领袖永远是该阶级最有知识的先进代表人物。”（《列宁全集》第4卷第256页）

在这里，列宁使用了非常肯定的语气，因为这是一个普遍真理。先进分子和领袖，总是同远见卓识联系在一起的；而远见卓识，总是和最有利可不开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无产阶级的领袖们，都是这样最有知识的人，无一例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举世公认，固不待言。就是象狄慈根、倍倍尔，虽然自幼失学，年青时就当了工人，但是，学识的广博，思维的精密，也是他们的同时代人所称道的。

毫无疑问，无产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都是无产阶级队伍的精华。那么，对无产阶级的科学家、发明家的作用又应该怎么估计呢？

大家都知道，按照唯物史观，工人阶级之所以是最先进、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所以能够在革命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并不是自封的，也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有科学的依据的。这个依据，就在于它代表着新的生产力。而当当代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情况来看，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主要来源，正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按照国有的统计资料，当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百分之六十到八十是由于采用新技术，有的生产部门甚至达到了百分之百。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如果没有科学技术革命，就根本不会出现现代化大生产。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中的最活跃的因素。而科学家、发明家、工程师、技术员等科学技术人员，正是同新生产力中的这个最活跃部分直接联系着的人，因此，科学技术人员不仅代表现有最先进的生产力，而且创造着新的更先进的生产力。他们是工人阶级中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最活跃的部分。而且，由于科学技术比较丰富，对于生产的全局和各工序的联系比较了解，生产企业中的科学技术人员，在组织纪律性方面，在维护生产系统的权威方面，在遵守工艺规程和操作规程方面，往往自觉性更高，更守更严。

在考察社会的革命革命问题上，人们常常比较侧重地注意到阶级斗争的唯物史观上。这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如果仅仅看到这一方面，那是远远不够的。马克思本人就经常把生产关系的革命和生产力的革命、科学技术的革命结合起来考察。他说过：“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为工革命的为生产力革命，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第111页）在论述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革命时，他还指出，蒸汽、电力和自动纺织机比当时法国革命领导人更为重大的作用。的确，对科学技术的革命作用，先进生产力的革命作用，是绝对不容低估的。同样，对工人阶级中的科学技术人员的革命作用，也是绝对不容低估的。

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当然还包括其他各行各业的专业家。他们都有各自的特点、专长和重要作用，这里不一一赘述。总之，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决不是工人阶级中的可有可无的一部分，而是工人阶级中非常优秀、非常宝贵的一部分。工人阶级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发明家、企业管理家、教育家、文艺家等等，如同工人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一样，都是我们工人阶级里面的先进分子，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是走在前面的人，起带头作用的人。

读过刘振邦同志的文章，又读了丁声俊、吴中流同志的文章，我认为刘振邦同志的主张是对的，丁声俊、吴中流同志的看法是错误的。

我想先摆一摆广西玉林县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两个时期农业生产的一些情况。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七年的八年里，全县粮食增长了百分之八十五，当时平均每人有粮食六百三十多斤。畜牧饲养业也有很大的发展。猪肉，国家牌价和集市价格没有多少差别，有时集市的猪肉卖到发臭也卖不完；鸡、鸭、鹅等家禽更是多得不得了。从一九五七到一九七七年，二十年时间里，全县粮食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二。但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平均每人占有粮食由过去的六百三十多斤降为五百八十斤。畜禽生产也是上升的，上升多少呢？很难说得清。反正是猪肉的集市价格比国家牌价将近高一倍，逐年过节食品公司要职工每户一只鸡都困难。问广大农民和职工，是一九五七年生活好还是一九五七年生活好，回答是“高佬跌交，（差）得远”。二十年来农业为什么上不去？照丁声俊、吴中流同志的看法，不是方针上的问题，而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是的，林彪、“四人帮”的破坏确实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但是，我们相信丁声俊、吴中流同志也清楚，在林彪还没有上台，“四人帮”还没有形成以前，从一九五七年以后搞农业生产就感到非常吃力。你反映农村的实际情况吗，轻则说你右倾，重则划你为右派。一九五七年说刮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到一九六二年又说社会主义社会整个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而且还要年讲、月讲、天讲。在这么一个政治气候下，“抓了月亮，丢了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的棍子满天飞。搞农业生产的，谁敢不抓粮食这个纲？事实上，许多农村干部已形成了“抓粮食保险，抓全面发展危险”的看法。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这句话，在实行过程中，只有以粮为纲才是真的，而全面发展则是喊喊而已。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也摆些事实：前三年，广西有个所谓一年办成的大寨县，自报粮食大丰收。它是怎么办成大寨县的？第一、抓改土，建设大寨田。改土的

畜牧为主 势在必行

广西防城港务局 张 强

肥泥哪里来？有的社员没肥泥可挖，便挖社员的菜园地，甚至连土带菜一起送到田里去改土。第二、反对商品生产，不许抓钱。集体种的一些经济作物，被指责为“以钱为纲”，“搞资本主义生产”；社员在自留地上种了一些黄麻、果蔗，说是自留地商品化。所有这些所谓反对以粮为纲的经济作物，一律限期毁掉。第三、畜禽可以不养，粮食一定要多交。一九七七年晚稻明显减了产，但要争大寨县这个面子，谎报粮食大丰收。结果，很多生产队饲料粮一斤不留，还要降低社员口粮去多卖双超粮。没有饲料粮当然不能养家畜家禽了。这样片面地以粮为纲建成的大寨县，是以牺牲全面发展和降低群众生活水平为代价的。单抓粮食，造成多大危害，由此可想而知。

在丁声俊、吴中流同志的文章里，通篇贯穿着这样一个论点：没有充裕的粮食就不能发展牧业生产，要走以畜牧业为主的道路，就得大量进口饲料。他们说刘振邦同志“忽视我国的实际情况”，“把粮食生产和发展畜牧业置于互相对立的地位”，“究竟是谁忽视了我国的实际情况，把粮食生产和发展畜牧业互相对立起来了呢？

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有必要讨论如下几个问题：第一、什么是畜牧业。丁声俊、吴中流同志没有弄懂什么是畜牧业，不知道畜牧业除了包括吃粮食的养猪业、养禽业之外，还包括专门或主要是吃草的养牛业、养羊业等。我国除了有十五亿亩耕地以外，还有四十多亿亩草原和数不清的荒山，如果说耕地少、粮食不多，不能发展养猪业、养禽业，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大量的草原、荒山发展养牛业、养羊业呢？第二、如何看待群众发展畜牧业的积极性。丁、吴两位同志只看到粮食不充裕，发展畜禽业有困难，没看到群众

为发展畜牧业而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前几年我在广西西南县多种经营办公室工作时，遇到这么一件事：马练公社有一个一百来人的生产队，因地处山区，稻田不多，增产的一点粮食又被社员卖双超粮去了，队里集体养的二十、三十头猪难以维持，他们准备把猪处理掉。正在这时，有个青年自告奋勇，要求当饲养员，把猪养下去。他当上饲养员后，一面收集秕谷打糠做饲料，一面到山上幼林地带间种红薯、木薯，几个月就解决了饲料问题，二、三十头猪不但养了下来，而且头头膘肥体壮。这件事说明，只要生产队增产的粮食不被全部交售，允许集体养猪场因地制宜地生产些粮食饲料，是可以逐步发展养猪业的；并不象丁声俊、吴中流同志所说的那样，非大量进口粮食不行。第三、怎样理解逐步走畜牧业为主的道路。丁、吴两位同志对刘振邦同志“走以畜牧业为主的发展道路”的主张，还没有弄清楚。所谓走以畜牧业为主的道路，前提在于走，这就是说要去干，创造条件，因地制宜逐步做到以畜牧业为主，并不是一声令下，在一个早上统统去掉粮食生产去养猪养牛。可是，丁、吴两位同志却不是这样理解问题。他们把逐步实现以畜牧业为主，理解为不顾时间、地点，不顾物质条件，现在就要立即做到畜牧业为主。这样理解问题有什么好处呢？这不是有意无意地给人们制造一种不必要的混乱吗？以上种种事例说明，忽视我国的实际情况，把粮食生产和发展畜牧业置于对立地位的，并不是刘振邦同志，而是丁声俊、吴中流同志自己。

说到这里我国农业生产的现实情况，特别不能忽视

两点：一、耕地少，劳力多；二、单靠发展粮食生产，再也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为说明这些问题，还是讲广西玉林县的情况。这个县二十年前的耕地是七十多万亩，现在仍然是七十多万亩。二十年前劳动力是二十多万个，现在却增至四十多万个了。二十年前每个劳动力种田三面左右，并不见得劳动十分紧张，现在每个劳动力只耕田一亩多，又增加了大批农业机械，农业劳动力就更显富余了。现在为什么有些生产队要轮流流出，为什么学生课余时间不能参加些力所能及的集体劳动？原因就是道路不够安排。农业生产局限于粮食生产，究竟浪费了多少人力？只抓“以粮为纲”，是使人民生活过得越来越好，还是过得越来越差，群众心里明白。今后如果还是集中精力抓粮食，粮食可能还会有些增长，但是能否赶上人民生活的需要，不能不叫人担心。因为耕地就只有那么多，即使提高单产还有潜力可挖，但是人口还会增加，粮食总产再增加一些，也不能使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提高多少。出路何在？这就得靠鱼肉蛋，靠中药、水果、蔬菜。这样一来，今后农业走什么道路就摆在我们的面前。走片面的“以粮为纲”的道路吗？事实证明已走不通。出路只有以牧为主，牧粮林并举，因地制宜，全面发展。也就是说，从现在起要把农村多余的劳动力组织和利用起来，因地制宜地发展养牛业、养羊业、养猪业、养禽业，同时抓好粮食生产和其它种植业。我相信只要有信心和决心，一抓到底，一定可以抓出成效来。这样不仅可以为不断增加的剩余劳动力找到出路，使之为社会创造财富，而且还可以逐步改变人们的食物构成，使人民生活越来越美好。总之，农业走以畜牧业为主的发展道路，是形势发展提出来的，也是人民的迫切愿望。以牧为主，势在必行，任何神仙和皇帝也阻挡不了。

开展一场关于农业思想的讨论

中国奥委会主席钟师统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布

我将派代表团参加明年奥运会比赛项目

据新华社北京十一月二十七日电 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决定，将派出代表团，参加明年二月在美国普莱希德湖举行的第十三届冬季奥运会速度滑冰、花样滑冰、滑雪、冬季两项等比赛，并参加明年七月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第十二届奥运会田径、游泳、体操等十五个项目的比赛和预选赛。这项决定是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由中国奥委会主席钟师统宣布的。

钟师统在中国奥委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总局联合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奥委会二十六日在洛桑宣布，经全体委员通信会议，批准了执委会名古屋会议的决议，即：承认中国奥委会为中国全国性奥委会，它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歌；同时，承认设在台北的奥委会，使用“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称，它使用的歌曲、旗帜和会徽，应有别于目前使用的歌曲、旗帜和会徽，并须经执委会批准。“这就是说，台北的奥委会将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机构留在国际奥委会内。中国奥委会已经决定接受这个决议，这就结束了中国奥委会与国际奥委会之间长期以来没有正式关系的非正常局面。中国从此在奥林匹克运动中恢复了应有的地位。这不仅对中国体育界具有至为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国际体育运动也将产生十分良好的影响。

他说，不少朋友都知道，中国奥委会早在二十年代就被国际奥委会所承认。新中国成立后，我曾派体育队参加了一九五二年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十五届奥运会。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被迫中断了同国际奥委会的关系。多年来，国际体育界越来越多的人士为了使中国在各个国际体育组织中的代表权获得合理的解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今天，这种努力终于在国际奥委会中开花结果。我愿借此机会，向国际体育界主持正义的朋友

法国新任驻华大使克洛德·沙耶

向邓颖超副委员长递交国书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二十七日电 法国新任驻中国大使克洛德·沙耶今天上午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递交了国书。克洛德·沙耶大使是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京的。

法国新任驻中国大使克洛德·沙耶十一月二十七日向邓颖超副委员长递交了国书。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二十七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今天下午会见了以美国会议务局副局长助理罗伯特·阿德勒为团长的美国造船业代表团。阿德勒集团在会时表示愿为发展中国的造船工业作出贡献。

王震会见美国造船业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十一月二十七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今天下午会见了以美国会议务局副局长助理罗伯特·阿德勒为团长的美国造船业代表团。阿德勒集团在会时表示愿为发展中国的造船工业作出贡献。

瑞士伯尔尼弦乐四重奏团离京回国

据新华社北京十一月二十六日电 瑞士伯尔尼弦乐四重奏团结束了对我

越南武装人员又多次入侵我领土制造流血事件

向我云南、广西边境开枪开炮，打死我边民四人，打伤多人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二十七日电 越南武装人员十一月间，频繁向我云南、广西边境开枪开炮，多次武装入侵我领土，打死我边民四人，打伤多人。

据有关部门统计，从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日，越南武装人员对我云南、广西边境武装挑衅事件达七十六起，其中云南地区五十四起，广西地区二十二起，共发射各种炮弹一百五十多发，炮弹一千多发。在这一旬之内所发生的较严重的事件有：十一日下午，云南麻栗坡县社员王庭明在打猎时被越南军设在我境内的地雷炸死。十二日清晨，一小股越南特务人员武装袭击我云南金平县十里村公社一带，打死我边民两人，打伤三人；我边防部队三名战士立即进行围剿，击毙敌人三名，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十二日中午，越南炮轰我云南马关县金厂公社上三家寨，炸毁我民房多间。十四日下午，一股越南两次窜入我云南麻栗坡县船头山的新寨袭击我，被迫住进山洞的新寨居民至今不能回村。十七日下午，越南三十多人数武装我麻栗坡县麻栗公社小寨，疯狂向我群众开枪射击，打死我社员一人，打伤多人，毁坏我房屋多处，抢劫大批财物；我民兵被迫还击，敌人狼狈逃窜。

决台湾地区运动员参加国际体育运动比赛问题”

他最后表示，希望在中国台湾地区的体育界朋友们，尽快实现双方的体育交流，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努力提高中华民体育的健康水平，使中华健儿迅速赶上国际体育水平，为推动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奥委会主席钟师统写信给台北奥委会主席沈家铭

期待中华体育健儿并肩出现在奥运会上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二十七日电 中国奥委会主席钟师统，今天写信给台北奥委会主席沈家铭先生，期待大陆和台北早日实现体育交往，共同搞好奥运会前的训练，期待中华体育健儿携手并肩出现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全国同胞和海外侨胞都会为这一激动人心的体坛盛事感到欢欣鼓舞。

“全体中国人民一致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三十年来，大陆和台湾的运动员被隔绝在海峡的两

边，互不往来，造成各种不便。这种局面再也不应继续下去了。我们特别热烈地期望着在明年奥运会会上，双方能够早日实现体育交往，以便相互观摩、共同提高。我们希望互派教练，彼此取长补短，共同搞好奥运会前的训练。为此，我们建议，双方尽快派出代表团进行会晤，交换意见，商定计划。我们欢迎您会派代表到北京，我们也愿派代表到你们那里去。对于来自台湾的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我们一定热情接待，并保证来去自由。我们也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能为双方的体育来往提供方便。”

钟师统最后在信中呼吁全体中华体育健儿，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为发展中国体育运动，促进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作出贡献。

中国科学院一些科学家就各方面的工作提出建议

把科技工作摆在实现四化的关键位置上

据新华社北京十一月二十六日电 在最近举行的中国科学院扩大会议上，来自全国各研究所的科学家，针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就发展经济和发展科学的关系、研究技术政策和科学政策、制定经济政策要尊重科学规律和科学家的意见，以及发挥专家的专长、重视边远地区的科技事业，和进一步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关于发展经济和发展科学的关系问题，许多科学家认为，我国经济底子薄，发展经济有许多困难，更应注意发展科学技术、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切实实地把科技工作摆在实现四化的关键位置上，从人力、物力上给科技工作以有力的支持。引进新技术和自力更生地发展本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应当并行不悖。

组织力量研究技术政策和科学政策

科学家要求：国家应组织力量加强技术政策和科学政策的研究。计算中心负责人冯康认为，国家应该尽快设立专门机构，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尽快地制定有关发展计算机科学的政策。

他希望在研究项目（即计算机的速度）的同时，组织人力物力大力开展有关计算机外部设备和软件的研究，以提高计算机的工作范围和运算能力。他说，计算机是一个体系，外部设备如果不配套，软件配不上，整机造出来就难以发挥作用。

土壤学家熊毅等人提出，应组织力量加强科学政策的研究。他们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雄厚的科学工作力量的储备，没有较高的基础理论水平，就不会有高度发展的技术，技术落后容易被发现，而科学落后却往往不易被觉察，因此也应该加强研究。

制定经济政策要尊重科学规律

他们认为，制定经济政策不应违背科学规律。植物学家侯学煜用自己的见闻阐述了这方面的道理。他说，在地形平坦、土质较好、水源充足容易发生过度放牧的地方，把草场用石头圈起来，有计划地管理、轮牧，建立“草库伦”，本是件好事。但据我不久前在内蒙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调查得知，有些部门不问具体情况，竟给这个盟的西部干旱地区拨款，要求他们也建设“草库伦”。结果，建在无水无水的石山附近和荒漠化的草原上

的“草库伦”既不能放牧，也不能耕种。建立“草库伦”这样一项具体措施，被当成草原建设方向，干部群众反映，这是一种很大的浪费。

要重视跨部门跨地区专家的意见。科学家们反映，在实际工作中不尊重科学规律，不重视专家意见的事仍屡见不鲜。为了切实发挥专家的作用，使国家不受或者少受损失，科学家们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十分重视跨部门、跨地区专家的意见。有的认为，应当有个立法，规定超过某种限额的工程设计方案，必须经过专家们讨论通过后才能实施。

培养高水平的管理人才

会上，科学家们还提出，希望特别注意发挥国内专家的作用。他们说，外国人的经验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外国专家的意见也应好好听取。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注意听取国内专家的意见，发挥国内专家的作用，因为中国专家最了解本国的实际情况。

科学家们认为，搞四化光靠科学家和工程师是不够的，还必须大批高水平的管理人才，没有好的管理人才，各项工作之间就不会协调，效率就低，甚至会出现混乱。大家建议，有关部门对科学管理人才的培养应该做出规划，对他们的职称要有明确的规定；还可以从现有科技人员和政治工作干部中选拔一些条件合适的人去加以培养，高等院校也应该增设科学管理专业，并招收新生。

要防止专家变为“通家”。科学家领导班子后，如何保证他们不致把科研工作陷到事务堆里拔不出来，无法坚持科研工作，有的只是星期天或晚上搞点科研。大家希望，尽量减少专家的家务性工作，配一些能踏踏实实做工作的干部、实干家当所长；有的提出，希望给专家配备助手。总之，大家认为，今后随着四化的进展，这个问题将越来越突出，研究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使担任领导职务的专家不至于完全丢掉科研业务，看来是很有必要的。

要重视发展边远地区的科技事业

来自边远地区的一些科学家在会上提出，希望制定政策措施时，要考虑到有利于办好边远地区的科技事业。他们列举事实说明，由于边远地区在生活和工作条件方面与内地，特别是大城市有差别，科技人员往内地较多，长此下去不利于边远地区科技事业的发展。因此建议国家调整有关政策，采取措施，在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方面，千方百计地鼓励科技人员到边疆去。

